

全球对话

7.1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4期，以17种语言刊出

后革命的埃及

Mona Abaza

质问实在

Luc Boltanski

南非的卓越机构

Sarah Mosoetsa

非裔美国女性的代表

Patricia Hill Collins

新加坡社会学

Vineeta Sinha,
Noorman Abdullah,
Youyenn Teo,
Francis Khék Gee Lim,
Daniel P.S. Goh

波兰的堕胎政治

Agnieszka Graff,
Elzbieta Korolczuk,
Julia Kubisa

特輯

- > ISA青年社会学家网络
- > 翻译《全球对话》成印度尼西亚文
- > 介绍印度尼西亚编辑团队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7卷 / 第1期 / 2017.1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编的话

接下来呢？

所有复杂的调查研究都没能预测到川普的当选，这显示了美国社会学家对自己的国家所知甚少。虽然我们有人研究右翼运动—例如 6.3 期刊登的 Arlie Hochschild 的文章—但是对于左翼运动的研究远多过于此。社会学家和其他人无异，也是物以类聚，多数研究反歧视、反不平等、反仇外的运动，但是若要了解其他不同的人，不是去牺牲我们的价值和信念，以不是去假装我们没有任何价值，而是要去更了解。这也必须让我们完全进到另外一个社群之中才得以可能。这个的重要性可在这一期和上一期的文章，关于反堕胎政治的研究中可以清楚看到。Agnieszka Graff 和 Elzbieta Korolczuk 研究波兰的反堕胎政治以及和反全球化的连结。Julia Kubisa 描述了波兰的反政府的街头雨伞抗议。Mona Abaza 则是分析了埃及的 2011 年革命之后的由赛西将军领导的反革命。

这期也刊登了著名法国社会学家 Luc Boltanski 的访谈。他摘要了何谓研究批判的社会学，说明批判源自于制度实在和生活世界之间的落差。冲突和断裂越演越烈，这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制度和全球化的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导致。这也是新加坡社会学家这期文章的主题。他们研究新加坡和新加坡的社会学轨迹，聚焦在前总理李光耀过世之后的变化。文章强调了统治意识形态和生活世界的真实样貌之间的差异，包括了社会流动、族群、宗教、政治等议题。

从亚洲我们转向非洲，特别是南非。过去两年来，大学一直是政治场域的斗争焦点。这期我们介绍了南非政府所设立的一个卓越机构，这是由社会学家 Sarah Mosoetsa 所领导的，主要支持人文社科的博士生、会议、图书出版等。

我们也刊登了科索沃年轻社会学家 Labinot Kunushevcic 对于女性主义非裔美国社会学家 Patricia Hill Collins 的访谈。另外还介绍了印度尼西亚的《全球对话》翻译团队。还有介绍了 Oleg Komlik 所带领的 ISA 青年社会学家网络。这是 ISA 的重要计划，目的是要支持下个世代的社会学家去成长茁壮。



Mona Abaza 是埃及顶尖的社会学家，著述包括伊斯兰、城市生活，这期探讨后埃及革命的军事化。



Luc Boltanski 是杰出的法国社会学理论家，这期讨论侦探小说和对社会学的重要性。



Sarah Mosoetsa 是具启发性的南非社会学家，这期描述其运作的人文社科机构。



Patricia Hill Collins 是顶尖的非裔美国女性主义者，这期谈论其知识和根源和边缘化。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出版社提供赞助。

全球对话以 17 种语言刊出，请至 [ISA website](http://isa-berkeley.org)。

投稿请寄给 burawoy@berkeley.edu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副主编

Gay Seidman.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í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

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Juwel Rana, US Rokeya Akhter, Toufic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Eashrat Jahan Eyemooon, Kazi Fadia Esha, Helal Uddin, Muhaimin Chowdhury.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Benno Alves, Julio Davies.

印度:

Ishwar Modi,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Pragya Sharm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度尼西亚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Roh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Abdolkarim Bastani, Niayesh Dolati, Marjan Namazi, Vahid Lenjanzade.

日本:

Satomi Yamamoto, Fuma Sekiguchi, Yutaro Shimokawa.

哈萨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Gani Madi.

波兰:

Jakub Barszczewski, Paulina Domagalska, Adrianna Drozdowska, Łukasz Dulniak, Anna Gańko, Krzysztof Gubański, Kinga Jakiela, Justyna Kościńska, Kamil Lipiński,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ęc,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 Teresa Teleżyńska, Anna Wandzel, Jacek Zych, Łukasz Żołądek.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ș,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Costinel Anuța, Maria-Loredana Arsene, Tatiana Cojocari, Florina Dincă, Andrei Dobre,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Rodica Liseanu, Mădălina Manea, Mihai-Bogdan Marian, Anca Mihai, Andreea Elena Moldoveanu, Oana-Elena Negrea, Mioara Paraschiv, Ion Daniel Popa, Susana Popa, Diana Pruteanu Szasz, Ioana Silistraru, Adriana Sohodoleanu, Andreea Vintilă.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Lubov' Chernyshova.

台湾: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编辑顾问: Gustavo Taniguti.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接下来呢?

2

> 世界各地的访谈

后革命的埃及: 访谈Mona Abaza

Michael Burawoy, 美国

4

质问实在: 访谈Luc Boltanski

Laura Chartain & Marine Jeanne Boisson, 法国

8

南非的卓越机构: 访谈Sarah Mosoetsa

Michelle Williams, 南非

11

非裔美国女性的代表: 访谈Patricia Hill Collins

Labinot Kunushevcı, 科索沃

15

> 新加坡社会学

李光耀过后

Vineeta Sinha, 新加坡

17

多种族文化过后

Noorman Abdullah, 新加坡

19

精英统治过后

Youyenn Teo, 新加坡

21

世俗主义过后

Francis Khék Gee Lim, 新加坡

23

全球化过后

Daniel P.S. Goh, 新加坡

25

> 波兰的堕胎政治

迈向不自由的未来: 反性别主义和反全球化

Agnieszka Graff, Poland, Elżbieta Korolczuk, 瑞典

27

在波兰捍卫生育权

Julia Kubisa, 波兰

30

> 特辑

ISA青年社会学家网络

Oleg Komlik, 以色列

32

翻译《全球对话》成印度尼西亚文

Kamanto Sunarto, 印度尼西亚

34

介绍印度尼西亚编辑团队

35



> 后革命埃及的命运

访谈Mona Abaza



Mona Abaza 是开罗 American University 的社会学教授。她也是知名的当代埃及学者，著述丰富，包括了《Debates on Islam and Knowledge in Malaysia and Egypt: Shifting Worlds》(2002)，《The Changing Consumer Culture of Modern Egypt》(2006)，《The Cotton Plantation Remembered》(2013)。Abaza 也在瑞典、新加坡、德国、法国、马来西亚、意大利、荷兰等国担任访问学者过。近几年她写了关于埃及当代政治变迁的许多文章，其中两篇刊登在《全球对话》(1.4 期和 3.3 期)。这篇访谈则是由 Michael Burawoy 进行的，Abaza 主要谈论 2011 年 1 月 25 日的革命以来的后续变化。

Mona Abaza.

MB：妳写了很多的文章探讨2011年1月25日的“革命”事件，包括了两篇刊登在《全球对话》的文章。该事件终结了穆巴拉克(Mubarak)总统的30年统治，并且开启了一系列的政治过程，最终莫西(Mohammed Morsi)被选为总统，但这个伊斯兰政权非常短(2012-2013)。在2013年7月Morsi被革职了，军队掌权，赛西(El-Sisi)将军掌权，并且在2014年成为总统。妳现在怎么看待这纷扰的六年，又怎么看待军队的角色？

MA：关于军队的介入，其实是相当有争议的，因为当初的Tahrir广场在穆巴拉克被罢黜之前，军队坦克开进了广场周围的街道。军队被认为是保护广场的抗议民众。而这个抗议事件若没有美国的默许和对军队行动的支持，是不会成功的。若是要说当时存在着“人民”和军队那时候形成的一种“兄弟情谊”，后来也有许多文章描述的军队的支持度其实已经下降很多了。要记住的是，有一张影像在2011年被传遍全球，那是一张抗议者在坦克车下面睡觉的画

面。另外的一张照片是在坦克上写满了反对总统穆巴拉克的口号，还有一张是一个年长女性在穆巴拉克总统去职之后在Tahrir广场上亲吻士兵。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的是，军队也于1月28日占领和包围了电视台大楼，这可以被看成是1952年7月的政变中推翻法鲁克国王的Free Officer占领了广播电台一样的象征。然而，占领军事最高委员会(SCAF)之后，军队的支持度就下滑了。那些在Tahrir广场上攻击人民的事件，对女性抗议者的性侵和施暴，Maspero的屠杀，Said港口的Ultra Ahly的谋杀，以及Mohammed Mahmud街道上的杀戮等等，这些都让军队成为反革命的象征。

回首过往，我们应该质疑把军队看成是站在抗议者这一边的诠释。当时这样的军队介入或许和支持自由民主不太有关系，而是军队掌握了这个可以摆脱穆巴拉克的机会，因为他儿子贾麦尔穆巴拉克(Gamal Mubarak)所代表的裙带资本主义和军队所欲掌握的经济利益是有所冲突的。但是，军队把莫西罢黜的事件则是另外的故事了，因为赛西被描述成民族的英雄，挺身对抗穆斯林兄弟会所代表的全球伊斯



Kasr al Aini牆，被移掉且置換上了一扇門。Alaa Awad塗鴉。Mona Abaza攝影。2012年12月7日。

兰的结盟。

MB：我们会回头讨论国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其经济基础，但是军队也想恢复旧秩序，不是吗？

MA：的确，在2011年1月之后，军队可说是无所不在，特别是在都市重塑的过程之中。集体记忆中，军队的坦克在城市中心这样的一幅景象可说是在2011到2014年之间出现、消失，再出现。我们见证了围墙被铲除，并作为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缓冲区，市民把围墙拆掉，以及为了安全把整个区域围起来等。当时警察也攻击和杀死了许多人，而致命的催泪瓦斯则夺取了许多人的性命。新成立的军队组织后来在街道上游行。其中一个高潮的事件是，2013年8月的Rabe al-‘Adawiyya之对于穆斯林兄弟会的屠杀。而兄弟会日益增多的军事恐怖攻击，也让军队的行动被看成是向恐怖主义宣战，特别是在巨大的、围绕着官方建筑和领事馆的一座凹墙被铲除之后(学巴格达的国际占领区)。有许多影像都显示了都市日常生活如何地被军事化，也导致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包括了处理、包围、抵抗军队的控制。

MB：在都市生活的军事化背后，对于竞争去控制经济这点，发生了什么事情？

MA：Zeinab Abul-Magd的重要一手著作²或许指出了军队在介入经济运作中的角色，也解释为什么其行动总是不被看见的。按照他的说法，军队介入经济场域已经好几十年了，大概占了25%到40%的埃及经济规模。这包括了各种大型

的计划，大型的食物和饮料生产工厂，咖啡店和加油站等等。像我说的，这解释为什么军队选择要罢黜穆巴拉克和他的儿子，因为其裙带资本主义组成了对抗军队的另外一股势力。

但是最重要的是，军队向来可以取得大量的房地产，这是由于有法律允许他们去取得土地作为商业用途。军队在各种超大型计划中的介入代表着有巨大的有利可图的机会。这在Mada Masr的报告中有军队土地计划部门的记载一样，军队和阿布扎比的Sheikh Zayed一起取得了新首都的16,000公顷土地和建筑管理权。³早先一年，赛西宣布了军队介入400亿的房地产开发案，这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Arabtec Company一起进行的。⁴然后Cairoserver告诉了我们于2014年国防部签署和Emaar公司(于大公国)的协议，要去建造一个巨大的Emaar广场，会包括在开罗市中心有座大型购物场，和Tahrir广场的新自由主义由Dubai出资的市场相互竞争。

这种市场经济的梦是透过威权的军队统治而得以可能的，在这之中，军队控制了大量的土地市场，并且交易不透明⁴当然，这不是市场经济和威权主义携手的第一次。

MB：妳描述了赛西将军的掌权对经济精英意味着什么事情。而这对于其他人，像是在阿拉伯之春成名的广场街道上的人，那又意味着什么？

MA：在莫西短暂的伊斯兰统治之后，对许多人来说，军队的占领意味着秩序的恢复。但这也

>>



新建立的牆，就在開羅American University的大門前面。Mona Abaza攝影，2015年9月21日。

似乎意味着旧政权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复辟。在2011年1月之后，人们见识到了匪徒治国（即使这是旧政权时代的匪徒）带来的犯罪和暴力。上千名的小贩商家占据了所有可能的空间，包括各种角落、街道、桥上，然后阻碍的交通。对于中产阶级来说，这是可怕的“失序”。但是，这其实告诉我们的是：许多年自由主义的失败，造成了当时的这幅景象。

赛西对于城市的复兴是透过“清理”市中心的手段，赶走小贩，但这些人可说是非正式部门的大众，将近五百万人。

MB：所以军队试图想要夺回对于街头的掌控，是一种权力的负面形式。那El-Sisi有试图要维护人民对于军队的支持吗？

MA：和西方专家认知相反的是，赛西藉由秩序和稳定等的叙事去获取支持度的，这事实发生早于他担任总统之前。而又如何可以理解苏伊士运河所召唤的强大人民参与和情感动员呢？短短的几个星期的时间，地方就资助了85亿，这显示了赛西能够动员国族主义情感的能力是相当可观的。⁶

David Harvey提醒了我们路易拿破仑的巴黎复兴是如何依靠城市的资本取得剩余价值而得以可能。⁷在拿破仑统治下巴黎的转变是和君主专制和权利剥夺一起产生的，这和赛西政权有着惊人的相似度。两者都把苏伊士运河看成是国族打造计划的一部分。拿破仑资助了运河的挖掘，而赛西则是扩大之。“复兴”的部份则也非常相似：两者都承认基础建设的扩张对

于取得城市的资本是很必要的。例如，埃及的军队非常忙碌地建造公路和桥梁，连结城镇到开罗。

MB：这比较是最有趣的地方，但是若我们看看历史上，你会怎么比较赛西和纳赛尔(Nasser)的国族主义？

MA：的確，當莫西於2013年被軍隊罷黜之後，賽西常被人們拿來和納賽爾比較，賽西強調的國族主義敘事和和穆斯林兄弟會的國際組織是相反的，後者被描述成是恐怖主義和危險的。當最近的一次“新蘇伊士運河”於2015年8月啟用後，賽西再次觸動了國族主義的核心。啟用典禮上的船屬於前第一家庭，而這同一個被用於1869年蘇伊士運河戴著歐仁妮皇后的船。該典禮可以被詮釋成是展現國家民族的榮耀的象徵，並連結到殖民/殖民母國文化，帶有新自由主義的味道。法國總統賀蘭德在典禮上被廣泛的注目，可見一斑。很有趣的是，1956年蘇伊士運河的國有化甚至難以比擬。

MB：非常好，所以你指出了那些大型计划想要投射国族主义的情绪，但是，至于对于日常生活的国族主义建筑呢？我知道你对于都市建筑很感兴趣，这个场域有什么变化吗？

MA：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国族主义的遗迹和改变。我们现在讲话的同时，Belle Époque城区中心(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建造)就历经了许多表面漂白的工程，例如Talaat Harb广场周围的建筑，这就像是穆巴拉克任内所作的如出

>>

一轍。⁸Orabi广场也被转变成行人广场，且政府也关闭了许多Sherifein街道上的咖啡馆，再一次地，这些可以被诠释成民粹的转向，提振民族意识，恢复街道的秩序。

註9：<http://al-ismaelia.com/buildings/>, accessed December 2, 2016.

MB：另外，有经济利益在这个民粹主义下被隐藏起来吗？

MA：是的，重塑Belle Époque市中心是很多资本家和巨贾有兴趣做的一件事情，其历史性的建筑很吸引他们的目光。而Al-Ismaelia房地产商已经取得了开罗市中心的许多代表性历史建筑，像是Art Deco Gharib Morcos Building (1916建造)、Kodak Buildings (1924)、Davis Bryan Buildings和Abdel Khalek Tharwat Buildings (1920年代建造)、以及Cinema Radio (1930年代建造)。⁹

MB：所以说国族主义的计划隐藏了经济的利益，但是，还有其他的利益在 El-Sisi 的民粹主义之中在作用着吗？

MA：的确，秩序的恢复和稳定这种论述已经遮蔽了对于人权侵害的注意，以及示威者的入狱和消失的事实。这样都似乎都比过去还受到更少的注意。然而，主要的问题仍然没有被解决，而且警察镇压还在持续着。沉默的大众逐渐累积了不满，预示另外一场社会冲突的诞生，但是，这对抗军队的代价是很大的，所以另一场暴力冲突将不可避免。■

来信寄给Mona Abaza
<mona.abaza@gmail.com>

註1：See Ketchley, N. (2014) “The people and the army are one han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6(1): 155-186.

註2：Abul-Magd, Z. (2016) “The Army and the Economy in Egypt.” *Midan Masr*, August 7, 2016, <http://www.midanmasr.com/en/article.aspx?ArticleID=222>

註3：Sawaf, L. (2016) “The Armed Forces and Egypt’s Land.” *Mada Masr*, April 26, 2016, <http://www.madamasr.com/en/2016/04/26/feature/economy/the-armed-forces-and-egypts-land/>

註4：Saba, J. (2014) “The military and the state: The role of the armed forces in post-30 June Egypt.” September 27, 2014, <http://www.dailynewsegypt.com/2014/09/27/military-state-role-armed-forces-post-30-june-egypt/>

註5：“From Tahrir Square to Emaar Square,” *Cairoobserver*, February 23, 2014, <http://cairoobserver.com/post/77533681187/from-tahrir-square-to-emaar-square#.WHN1ptLhCM8>

註6：Oakford, S. (2014) “Egypt’s Expansion of the Suez Canal Could Ru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October 9, 2014, <https://news.vice.com/article/egypts-expansion-of-the-suez-canal-could-ruin-the-mediterranean-sea> (accessed December 2, 2016).

註7：Abaza, M. (2014) “Post January Revolution Cairo: Urban Wars and the Reshaping of Public Spac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30, 2014.

註8：Ibid.

> 质问实在

访谈Luc Boltanski

Luc Boltanski是当今最杰出的社会学家之一。他是Pierre Bourdieu的之前的合作者，也是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EHESS)的研究院院长。1990年的时候，他就在与Eve Chiapello合写的书《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1999, 巴黎)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组织和宰制的新形式。然后，其研究转向了批判行动的研究和国家社会学。2009年出版的《De la Critique》在2011年就了英语译本，称为《On Critique》，是一本反映出他对于制度和实在之间关系的转折点的作品。2012年其出版了《Enigmas and Plots》，这本书是关于侦探小说从19世纪的诞生与传播的研究。访谈者是Laura Chartain和Marine Jeanne Boisson，皆为EHESS的博士候选人。其聚焦在新书《Enigmas and Plots》，并讨论用来质问和批判制度的工具和取径。我们特别感谢Alex Barnard, Nathalie Plouchard-Engel和Emily Murphy把法文访谈翻译成英文，以下是访谈的节录，完整版可到Global Express看到。



Luc Boltanski.

LC & MJB: 首先想问的是，你怎么想到要去研究侦探小说的？

LB: 我完全（或几乎完全）不是侦探小说的读者！就像其他人一样，我只有在睡不着的时候才会读。可是基本上我想要去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一种体裁，不怎么特别有趣，也透露出许多社会的保守观点的文学形式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的确，这是一个主要的叙事体裁，不论是书、电影、电视都是，这很有趣。

我的生涯让我自己融入到研究调查，以及在自传的程度我有一位记者的儿子，我想要检视不一样的研究调查。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外遇”和“政治丑闻”是萨科奇总统任内常出现的字眼。这些外遇和丑闻让调查和反调查得以可能。我问我自己，为什么“调查”在当代西方世界扮演了那么重要的角色？这个问题让我去探讨各种调查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别，以及各种进行的方式。

LC & MJB: 你曾试图要去找侦探小说的起源吗？

LB: 这是一个古典涂尔干的取径，同时也是傅科式的考古学取径。当我们在变成布迪厄掌所说的场域影响产生之前掌握了某个现象的起源时，我们对之的理解会更好。第一，一个新的体裁被创立了，然后作者们试图要去区别自己和他人。也就是他们怎么修改体裁，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不同形式的侦探小说。我试图去回到这个体裁产生的原点，去透过半结构的方法研究侦探小说和其诞生的历史脉络。但我把这本书视为一个起头，提出问题，而非答案！

LC & MJB: 在《Enigmas and Plots》中你发展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说每个研究都可以是被社会行动者所带领的，因为当其注意到了被制度所形塑的“实在”和他们所经验的“世界”

>>

存有鸿沟的时候，就得以可能。这个差距可以产生不同意，质疑、问题。你这本书指出了“谜题包含了一些在社会秩序中运作中足以可能撼动实在的某件事情。”

LB: 的确。谜题对于侦探小说来说是很特别的元素，就像 Edgar Allen Poe 所发明的一样。格式塔心理学家也处理了这个谜题的概念，其是从某个被认为是稳定和似乎不证自明的事情中而来的。这本书的概念基础是奠基在我先前的一本书《On Critique》上的。该书我做了“实在”和“世界”的区分，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区分。简言之，实在指涉了被制度形塑的稳地的秩序，而世界指涉了那些社会行动者不能预测到的经验。

这个区分目的是要去响应那些被实在在社会建构论典范所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 Ian Hacking 的著名的书《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中被提出，若每一件事情都是被建构的，那从什么观点来说我们得以掌握这些被建构的事物呢？难道解构，也就是承认了所有的事情都是被社会建构的，不也是一种新的建构吗？难道这个取径不会导致一种相对主义让社会学家的研究都变成武断的吗？因此，我想把这个实在的社会建构观点好好的研究一番，找出社会制度怎么形塑了实在。透过区别世界和实在，我们可以找到参照点，然后去区分实在的建构和世界的经验。因此，我们必须把从 Moore、Schütz、苏格兰启蒙的“常识”的理论先放一边。

另外，也有必要去从行动所产生的不确定开始。但是，当然我们的经验都是定锚在实在中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当你等巴士的时候，你会期待巴士每 15 分钟会来一班，这就是从实在中的形式中所经验到的。巴士站牌、巴士公司、以及都市都一起建构了巴士站和时刻表。然而，巴士或许不会准时到站，因此，我们许多的经验是透过世界的不确定而得到的，这些经验很难去变得很明显。

而被制度形塑的行动框架是比较容易去描述和整体化的，因为他们已经被国家（但不只有国家）透过选择而客观化。我们可以描述行动者面对了什么样的被制度形塑的实在形式，他们怎么批判之，怎么论述之，怎么去创造新形式。批判有助于去解释这个经验的体裁。

因此，我想要思考实在的是会建构什么和制度连结在一起，以及设定了什么样的媒介去减少不确定性。在《Enigmas and Plots》一书中我把欧洲民族国家的计划，特别是 19 世纪后半的民主形式，看成是去结构实在并且让行动可预测，透过法律以及警察，也透过社会和自然科学。我这个观点被傅科的生物政治概念影响很大。

让我讲另外一个我喜欢的例子。我有个朋

友在 70 年代是个坚定的左派女性主义分子。她和其他人，有男有女，一起加入了极左派阵营。有一天，她发现到，尽是女性负责把传单放到信封里面，或是女性煮咖啡。所以她们后来怎么样呢？她们驱逐了男生，把女性自己锁在一个房间讨论了 24 小时。而那就是法国女性主义的诞生时刻！在那之前，那些人都有分析的经验，所以也并不是无中生有。但我想这个运动透过学习而发展，透过社会学、心理分析、工会行动等等，透过掌握经验并且去分享之。

LC & MJB: 社会学家是怎么解释行动者的经验的？

LB: 若要去达成客观性，社会学家必须去把描述的工具和那些可以让我们批判性地去看这个实在的参照点连结起来。这不能被连结到某些特定的道德，因为这些批判参照点应该宣称某些普遍性，这就像我在《On Critique》中所解释的一样。其中一个去处理这个议题的方式就是当行动者在批判的时候，去跟踪他们。这些行动者都是实在论者，他们都会在行动的时候考虑当下的情境，以至于可以把脉络转化成优势，例如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所以一个工人可以对老板非常礼貌，但是在家却是另一个样。

我想我们应该跟着社会建构的过程，也就是人们自己建构世界的方式。一开始，每个经验都是特殊的，都是独特的，但是后来会分享经验，然后趋同，用特定语言去描述，按照需求去改变，然后试着去建构新的论述，并且改变实在的形式。所以去仔细看批判的运作和其建构与解构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透过阅读小说去跟随他们，也透过访谈、透观察龃龉。社会学研究必须跟踪建构和解构，并且去建立新的实在形式。

LC & MJB: 你认为社会学家应该更进一步，并且从行动者和制度的行动计划出发去分析他们所依赖的框架吗？

LB: 我现在认为不可能去从事一种完全实用主义、分析处境的社会学研究。而行动者也不是这么行动的！行动者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是依赖于他们仅能够有限地控制的决定，而作为个体，也依赖于那些他们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制度，这些形塑了其处境。但是行动者也可以用自身的优势去产生矛盾，并且影响制度建构现实的方式。从我一开始讲的巴士的例子来说，他们可以显示，虽然巴士必须准时，但是这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发生过。

为了去批判实在形式的创生，社会学不仰赖特定的道德论述，而是去看行动者如何去质疑那些实在，并且试图去建立更公平的形式。但是，社会学家可能会试着进一步顺着行动者

去建立新的实在形式。他们应该使用整体化工具，因为该工具客体化了行动者经验所依赖的稳定化。他们应该进行几乎不可能的操作，包括连结这种研究和规范性的判断。在我的《On Critique》一书中，我透过社会学的历史去描述这样的操作怎么进行。我的论点并不是一种“假说”，因为这很难用经验去描述。但我认为实在的稳定化是很难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去达成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不断地去干扰。这些资本流动威胁到了那些对于同质化某个领土中的人口相关实在的努力，许多的研究，特别是 Gérard Noiriel 对于边界的强化的研究、对于身份证明文件的研究、以及语言的统一化，都分析了国家想要同质化领土和人口的努力。在法国，Jacques Revel, Dominique Julia, 和 Michel de Certeau 等学者在 30 年前就聚焦在这个主题上了。这个研究也部份参照了 Deleuze 的领土和流动的对立，因为民族国家一直被资本的流动所断裂，在这社会脉络下，侦探小说诞生了，这是超出了民族国家所可以也所意图去建构的实在。

LC & MJB: 这需要社会学家去超越民族国家的脉络，发明一种新的整体化架构好得以掌握这个架构的创生和去稳定化吗？

LB: 是的，的确如此。我为什么对于侦探小说的历史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之间的关系感兴趣呢？为什么我可以去做这研究？我会做这个是因为这个关系框架已经非常有危机了。同时，即使很难去描述外部性，我也从外部去观察这个架构。透过思想实验，我们至少可以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框架。而对于今日的社会学家来说，核心问题是社会学的结构很大一部分是依赖于 19 世纪的民族国家框架，这对于法国来说是如此，但是不仅止于法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英国社会学，德国社会学，法国社会学等等，今天我们也历经了这个框架的式微和转变，许多社会学的工具已经不再适用，所以我们必须重建新的方法去应付那些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挑战。对于那些进入这个社会学技艺的人来说，这是你必须去做的是事情！ ■

来信寄给 Luc Boltanski <boltansk@chess.fr>,
Laura Chartain <laurachartain@gmail.com> 和
Marine Jeanne Boisson <boisson.marine@hotmail.fr>

> 南非的卓越机构

访谈 Sarah Mosoetsa



| Sarah Mosoetsa.

南非的大学在种族隔离的遗绪下面对了对极大的挑战。我们看到了种族隔离导致了学生运动近来的兴起，像是 #RhodesMustFall 和 #FeesMustFall。但是，这些不应该让我们无视南非的新实验：国立人文社科院 (NIHSS) 的成立及成功。这是非洲相当独特的机构，由南非高等教育训练部所资助，已经资助了许多新生代的博士生和学者，并鼓励对话，讨论南非的历史和未来。该机构由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的 Sarah Mosoetsa 所带领，她是著名的《Eating from One Pot》(2012) 一书的作者，该书描述面临工厂关闭的家庭生存策略。这篇访谈由 Michelle Williams 所作，她是 Sarah Mosoetsa 在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的同事，该访谈聚焦在 NIHSS 的挑战和成就。

MW: 请告诉我们 NIHSS 的缘起？

SM: 或许我可以从历史脉络开始讲起。2010 年 Ari Sitas 教授和 Bonginkosi Nzimande 博士（高等教育与训练部长）询问我去成立一个两人的工作团队去研究南非的高等教育人文与社会学科的状况。部长关心的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已经让位给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个印象是因为人文社会学科并不在国家变迁的前沿。所以该工作团队的任务很广，要找出事实，并且以访问国内的学者为基础。Sitas 教授是团队领导，我则是副手。

作为教育部的任务团队，我们拜访了

>>

所有的大学，并且和学术从业员、管理阶层、校长、系所等进行交流。我们发现到很令人惊讶的事实，因为我们发现自然科学固然很重要，但是它们的成长是以牺牲了人文社会科学为代价的。所以高等教育分裂为二，但是，我也发现了人文社会科学成功的故事。

MW: 所以这就是 NIHSS 的开始吗？

SM: 是的，任务团队后来写了报告，叫做“人文社会科学章程”，报告列出了挑战，以及人文社科如何可以复兴并注入新的能量。该报告建议设立国立人文社会科学院 (NIHSS)，部长采纳了建议，而我们马上着手开始准备设立。2013 年 12 月该院初步成立，理事会后来在 2014 年 5 月询问我作为院长，然后，我就和理事会一起规划成立的细节。

MW: 据我所知 NIHSS 有很多部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SM: 总共有 7 个主要部门。让我从介绍博士奖学金部开始。每一年我们发给南非的学生奖学金就读博士。关于这点，我们和南非所有的公立大学人文社科院院长们密切合作，院长会推荐学生给我们（他们内部的审核）。然后 NIHSS 有自己选择这些被推荐者的标准，这是个透明的过程，一开始会对所有的学生发出申请邀请。受奖者有 80% 黑人学生，60% 女性。截至 2016 年底止，共 451 名学生获该奖学金，此外，也有 111 名受奖者是其他非洲国家的学生。

MW: 那很有趣。所以你们也资助非洲其他国家的学生吗？

SM: 是的，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非洲愿景计划 (African Pathways Programme, APP)，这是认识到南非其实接受了许多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学生。透过 APP，我们每年提供了 37 名奖学金，这个想法是期待我们可以给其他非洲国家鼓励，也一起为 NIHSS 注入活力。我们希望走出历史，和其他国家合作。

MW: 可以多谈谈这个合作吗？

SM: 作为一个新的机构，我们必须和其

他非洲国家合作，特别是多数没有类似的机构。我们和非洲社会发展委员会 (CODESRIA) 一起选择学生和合作，这个合作关系发展的相当好。

NIHSS 也设立了非洲愿景流动计划，这是被欧洲伊拉斯莫斯世界计划模式所启发的，为的是去研究非洲大陆，然后找到新的研究想法。我们资助研究的旅行，建立联络人和网络，并致力教学和研究合作。

MW: 回到南非，我想知道是否有困难找到足够的博士生？

SM: 这是好问题啊！的确，我们头两年是有困难的 (2013-15)，因为要让他们知道有学生被奖助，这一开始比较难。现在我们已经着重在学生的素质了，确保他们可以毕业。在南非我们的毕业率大约 50%，所以我们还成立的导师计划去帮助学生。

MW: 那听起来很重要，可以跟我们说这个指导学生的计划吗？

SM: 21 个现任和退休的教授被派去指导学生，例如，在 Western Cape 我们成立了地区的博士班，配有两个导师。导师要定期和学生会面，提供指导和建立关系。他们提供了各种研讨会，讨论方法、理论、写作等。导师提供经验，但学生也相互学习。我们把同侪学习视为非常重要的一环。读博士是很孤独的，而这个计划帮助形成了一种团队连带情感，导师也很慷慨，甚至帮助了大学的转型。我们有办法借助退休教授的经验和技巧，并且让他们有机会去成为转型过程的一部分。

MW: 除了资助博士生之外，NIHSS 有其它的运行模式吗？

SM: 是的，我们有一个至关重要研究计划。这资助了创新和前瞻的研究，鼓励学者去走出旧的研究问题，找新思考方式，新的方法，新的网络。这个计划或许从以往的赞助者那边没有办法保证得到捐赠，但是，我们会有其他的赞助者。我们也认识到一个事实，就是人文社科学者是以写书为主，但是，赞助者主要

>>

是写期刊文章。最后，这个计划也补助荣誉优秀大学生和硕士生。

MW: 这样的“非主流”研究通常可能很难找到出版的刊物，你们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忙吗？

SM: 像我说的，我们资助、开启、并合作计划，这不仅仅限于学术研究和博士生。我们发现有些很好的作品并无法发表，因为出版社认为作品虽好，但是并非“财务上可行”。我们不会告诉出版社要发表什么，但是，我们会资助那些和我们的目标有共鸣的作品发表。但是还是要通过出版刊物的同侪审查的过程，我们会资助出版所需的费用，或是预定一定数量的书籍，或是直接补助出版。我们也资助会议的出版品。

其中我们最引以为傲的是国家图书奖和创新奖，这从2016年3月刚刚开始。我们奖助6名，包括了非小说和小说书籍，编辑丛书，数字媒体以及艺术。奖助是限定给南非的大学学者。而第一个奖助是给从2013年到2014年的出版品，我们对于申请的数量可说是应接不暇，这代表了人文社会学科的蓬勃发展。我们于2017年3月会有另一次奖助。

MW: 南非向来有学术介入公共事务的传统，你对于这点有什么计划蓝图吗？

SM: 事实上，我们有个人文学科汇集部门(Humanities Hub Program)，资助在主流学术场域之外的知识生产。我们首先在Liliesleaf Farm开始试办，因为其有着丰富的历史，是60年代地下解放运动的发源地，也是Rivonia审判人士被捕的地方。遗憾的是许多学者和学生并不知道这个地方。而这个计划也把这样的历史地点转变成知识宝库，以及促进另类思考历史事件的地方。Liliesleaf Farm会主办会议，以Freedom Charter为核心，提供不同思考历史和推动对话交流。像你说的，我们从解放运动学习到好的想法是可以从学术与非学术之间激荡出来的。

MW: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些方式的具体例子呢？

SM: 我们的“人文学科汇集”主要是让学生对于人文社科感兴趣。例如，高中生会到Liliesleaf Farm参访，学习历史。这是一种新的教学方式。但是也不是适用到所有学生，所以我们还发展出了移动展览，把“小小的Liliesleaf”带到像是南非大学，Venda大学，或是Limpop大学的校园去。

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讲述人文社科故事的方式。它让不同历史的对话、关于自己的对话、以及自由宪章的对话得以可能。我们发展出了自由宪章表格，必有建议字段。我们问人们两件事：第一，如果你将要重写自由宪章，你会纳入什么？第二，自由宪章的那一个你最喜爱？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绝妙的答案，并且浮现出许多议题，像是失业、贫穷等议题。Liliesleaf是个先导计划，我们也计划去把“人文汇集”带到其他的地方。

MW: NIHSS有国际的部门吗？

SM: 透过我们的南方—南方网络，我们已经开启并资助了印度—南非研究计划，是和印度社会科学委员会一起合作的。我们和其他国家像是巴西等也研究类似的合作计划的可能。

我们也协调组织了金砖五国南非智库，这是一个给五个新兴经济体的组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那里有各种不同的部门，像是商业、学术、社会等，我们组织学术部门，包括了和五国的学术论坛，都是接在金砖五国高峰论坛之后。这个组织主要把重点放在政策和献策给政府。每年主题不一样，像是社会安全、健康、教育、能源，主要由地主国决定。论坛会通知高峰论坛以及国家的领导提供政策建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立学术和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界面。

MW: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可以有如此的成就，相当令人惊讶，而你遭遇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SM: 我想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我们

>>

机构至今只有三岁，但是完成了很多事情。NIHSS 由高等教育训练部所资助成立，但是在政府部门的框架下做事其实有很多挑战，我们完全仰赖政府的支持，事情的推动都是透过官僚体系。没有政府，其实什么事情也不能做。整个过程也是集体的，我们和理事会密切合作。

一开始我们面对了来自学界的反对，有些人担忧我们会取代了原本的校系，抢走资源，并让高等教育部掌控了一切。但是，当初的反对者如今都成为了最大的支持者。NIHSS 是一个法人，对独立的理事会负责。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取代原本的大学，反而是互补。

一些日常生活的挑战是和部门的运行有关的。我们仍然在设置内部的系统。例如，我们实验一些新的 app 去让导师计划可以更好地运作。作为新的机构，我们也学到了很多。我想是需要 3 到 5 年去让整个机构到位。我们很高兴有目前的成果。

MW: NIHSS 的未来愿景为何?

SM: 我想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 NIHSS 成真，是很棒的！部长是很重要的一环，

但并不是唯一的一环。部长的支持让我们可以蓬勃发展，他是真的在看我们的文件，和我们交流，提出问题，并且支持我们。这是 NIHSS 最好的奖励。有些人想知道若是部长去职之后会怎么样，我想，政治在任何地方都是流动，所以这是个问题，但是我们努力去让人们知道我们的成果，我们已经确保了 2019 到 2020 的资金，届时，我们希望有 300 名博士毕业，举办 4 个奖助循环，而且最后奖助 40 本书的出版。若这个达成了，我们就 算是大功告成了。我们已经是在最短时间内达成最多事情的组织了。

我很高兴，也很戒慎恐惧，也很兴奋。我们南非的人文社科拥抱了这个机构。我对于学者们的响应感到很喜欢，当我要求审查文件、当评审、指导学生等时，从来没有被拒绝。学术界把我们当作一项宝贵资产。■

來信寄給 Sarah Mosoetsa <mosoetsa@nihss.ac.za> 和 Michelle Williams <Michelle.Williams@wits.ac.za>

> 美国非裔女性的代表

访谈Patricia Hill Collins



Patricia Hill Collins.

Patricia Hill Collins是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杰出社会学教授，也是美国社会学学会的前会长。她是顶尖的社会理论家，其发展出的概念像是“多重压迫”，“交织性”，“局内的局外者”等都是在她著名的经典著作《Black Feminist Thought》(1990)，《Fighting Words》(1998)，以及《Black Sexual Politics》(2006)中所发展的。以下是Labinot Kunushevc (科索沃University of Prishtina的硕士生)对其进行的访谈节录。

LK: 从你的观点来看，什么是研究社会不平等最适当的理论和方法取径？

PHC: 对我个人来说，我是从研究“宰制论述”开始的，因为西方的宰制论述包括了知识的生产与形成，这个过程产生了霸权观念和实做。这个宰制论述主导了知识辩论的方向，譬如：什么是重要的问题？什么称得上是证据？什么又可以被忽略、视为次要的？在美国，宰制论述透过种族、阶级、性别、性倾向、国家等的权力系统交织而被形塑出来。我的研究中指出了种族主义、性别偏见、阶级剥削、异性恋霸权如何运作而形塑了社会群体的生命经验。黑人女性的经验是进入这个权力与知识相关问题的切入点，但是黑人女性的经验不会是终点。我研究美国非裔女性所面对多重权力体系所共同建构出的社会问题。以暴力为例，加诸在非

裔女性的家庭暴力是透过她们的男友、丈夫、父亲而施加的，而这些家暴者的行为又是在国家所默许的对待黑人的种族暴力和奴隶制度、种族主义的遗绪与脉络下发生的。这两种暴力相互赋予了彼此意义，两者是相连的。而我也研究黑人女性主义，去看黑人女性知识分子和运动者，像是Angela Davis, June Jordan, 和Kimberlé Crenshaw, 她们怎么论述了黑人女性面对的困境与问题是无法透过单单研究单一的宰制系统而获得解决。她们透过研究黑人女性的特殊经验，提出了压迫的同时性的问题，这也开启了一个蓬勃的知识领域，我们现在称之为交织性(intersectionality)。

权力系统的结合形塑了宰制论述，不同社会的宰制论述是可能不同的。譬如说，美国的种族、阶级、性别、性倾向、公民身份的交集

>>

反应了美国历史的特殊性。我的理解是，像是你的国家科索沃，是一个新的国家，有不同的力量在形塑着宰制论述，例如可能是族群、阶级、宗教，这是科索沃历史的特殊性而导致。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必须记住的是，不论历史有多么不同，精英群体总是掌控着论述和知识。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精英群体，但是社会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意味着虽然社会中每个人都被宰制论述所影响，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有办法去形塑宰制论述。

回到研究社会不平等最适切的理论和方法这个问题，这有赖于一个人处于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关系的位置，以及那一个知识领域是你想要去加入的。我的话，我是选择与理论的领域对话，认为当注意到了知识的认识论基础之后，就更接近权力的核心。我研究权力关系的各种不同面向，特别关照如何形塑知识。以这个观点而言，交织性的架构是很好研究社会不平等的切入点，在学术和政治之中皆是如此。

LK: 媒体对于女性压迫和解放的再现，其扮演的角色为何？而又怎么影响了女性再公共领域的参与？

PHC: 所有的女性都经验过大众媒体怎么呈现女性要如何成为女性。但不同的社会会有不同的女性再现。在美国或是类似的多文化社会，媒体的女性再现是在不同程度上由种族、性别认同、族群、阶级、公民身份等而交织成。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美国女性是其他女性的模范与理想，这是一种社会建构。传统上，这个女性理想形象是家庭主妇，但最近这变成了女性从事高薪的工作。在多元文化中，其他群体的女性若是越接近这个理想形象，她们就越会受到欢迎。

在《Black Feminist Thought》一书中，我看的是美国非裔女性所面对四个刻板偏见：第一是骡子 (mule)，就是女性就像动物般的工作不会有怨言。第二是耶洗别 (jezebel)，是一个高度性欲化的女性，像是妓女一般。第三是老妈子 (mammy)，黑人的女性家务劳动者，对于雇用自己的人有着高度的忠诚。第四是黑

人女士 (Black lady)，指的是受过教育的黑人女性放弃家庭而选择职场。但是这些再现不仅仅是刻板印象，对于过往种族主义、性别、阶级压迫的时代错置，它们还掌控着对于黑人女性如何被对待的社会脚本。更重要的是，黑人女性被期待着去内化这些脚本。

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运动是希望去打破这些刻板再现和所代表的权力关系。当女性拒绝成为家庭主妇、骡子，拒绝低薪和没有保障的工作，或是拒绝当一个总是听命丈夫和上司的服从者，那么她们就是有意识地介入了公共领域。再现的改变是可以改变行为的，而行为的改变则可以改变公共领域中对女性的看法。■

来信寄给 Patricia Hill Collins
<collinph@umd.edu> 和
Labinot Kunushevc
<labinotkunushevcj@gmail.com>

> 李光耀过后

Vineeta Sinh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SA出版副会长, 2014-2018



观音寺庙的华人在掷交抽签，在南兴都庙附近。Daniel Goh摄影。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似乎成为了新加坡这个民族国家认同与存在的代表。而新加坡式的治理和李光耀的确有关，而且也源自于他，被称为“实用威权主义”、“软性威权主义”、“启蒙专制主义”、甚至“良性独裁”。国家对此的论述坚持着精英统治、多元文化主义、法制的原则，为的是一个干净的政府、有效的官僚体制、现代化、经济成长与繁荣、以及世界上高的人均所得。召唤了一个接受其族群的社会文化差异、赋予“平等”给各方的意识型态（见 Noorman Abdullah 本期的“多元族群主义过后”一文），这样的论述不是关于数字的相等，而是机会的平等，以表现为优先，拒绝了官方和被制度化的族群歧视。但是这个强大的信念是在形成一个种族差异和种族主义上相当有挑战性的，因为其已经让经过计算的精英统治内部矛盾和政治隐藏起来（见 Youyenn Teo 本期“精英统治过后”一文）。

新加坡的政治管理和治理风格总是以规划、效率、控制、管制为优先。社会的日常生活运作是被官僚看成是洁净诚实的实做，而且有效率，并且可能太有效率了。从英国殖民承袭而来的是，这样的“下层建筑”已经被领导阶层训练且谨慎地再生产，确定遵从着被治理的行为模式，这是会让韦伯惊讶且困扰的。中央集权的治理原则和紧密地和所有社会领域结合互动，这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国家机器以及一个支持的官僚组织网络才得以可能。国家就是透过这样中介制度去施行政策、影响民生，也不可避免地是在无所不在的威权、实用主义意识型态下被制约。Carl Trocki 在论述新加坡的“控制的文化”的时候说新加坡国家是在后殖民时代中对社会“负起完全管理和监视的责任”。Chua Beng Huat 和 Kwok Kian Woon 也认为后殖民独立新加坡的“国家介入扩张和集权”减少了日常生活各个领域

的自主性。

学术和非学术的论述都把新加坡紧紧的和李光耀连结在一起，以及其不妥协、威权的政治。新加坡公民已经被典型描述成了一个保守、害怕、屈服、被动的面貌。然而，新加坡人也长期批判高压统治，“用铁锤去敲开坚果”的治理方式，这是一个整合但有时很累的公共论述。

而政治结构和社会科学的关系为何？新加坡的社会学已经长期以来透过李光耀的观点来论述。后殖民的新加坡领袖以经济成长为优先，这反应了新兴独立国家的需要，因为经济发展和被规划的社会变迁是急迫的。社会科学研究（多数由国家补助）也被认为要“相关”，若不是直接和现代化有关，也必须符合国族建设的需要。从1970年到1990年，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是主要去提供新加坡快速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的信息，反应民族国家管理多族群、多宗教人口的优先倾向。

然而，最近大学里的社会学家和国家利益的结盟——从来不是绝对的一变得比较脆弱了。新加坡的社会学家已经问题化了国家的论述和多元文化主义、精英统治、家庭、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历史、多宗教性、宗教和谐、贫穷和不平等的缺乏等等。新加坡政府也开始建立自己部门研究的能力，这可能降低对于学术研究的依赖。

不易外地，李光耀 2015 年

的过世触动新加坡人发自内心的响应，这个国家吊念新加坡现代化的建筑师。但是有趣的是，这却也是解放的时刻，不用受到国家约束和管制，并且迈向自由，包括政治在内。

但这个很愉悦的论调必须透过社会学的想象来平衡一下。作为一个研究新加坡的民族志研究者，我的宗教研究聚焦在日常生活的。若从广泛的社会政治生活组织作为给定条件而言，新加坡的神圣领域也相似地镶嵌着高度理性化的心智状态，被官僚、行政、立法的边界框限着。新加坡的宗教地景特殊性，特别是官僚文化以及对于宗教表述的影响，是需要被解释的（看本期的Francis Lim的“世俗主义过后”一文）。

把新加坡的国家看成是一个介入型的国家是我研究的起点，这连结到了新加坡宗教地景的“复杂性”（messiness），可显现“寺庙丛林”（jungle temple）的世界（在一般民宅中的寺庙，为的是躲避国家规范），以及宗教崇拜的场域如何紧密结合了印度教徒、道教徒、佛教徒、天主教徒的日常生活。因为宗教实做者在高度被包围的场域中重新开创了一个神圣的地理空间和意识，所以新加坡都市的拓朴学显示了“混乱”（disarray）和“失序”（disorder）的宗教场域，宗教典礼仪式甚至在体育馆或是游泳池举办。而对于谨慎规划的“神圣/世俗”和“公/私”区分的忽视就是李光耀年代新加坡宗教的典型特征。这和把新加坡看成是被净化、贫脊、被过度管制的社会这样的法，是不同的。

而每一天又可以怎么和政府的结构去进行协商呢？尽管官僚结构和介入的坚实存在，对于宗教试验的渴望定义了新加坡的宗教领域。当国家介入的确重构了宗教场域，它并没

有拿掉了宗教创新与创意。管制宗教意外地开启了宗教自由。实际上，官方制度的迷宫允许了协商的空间，因为实践者会去策略性地面对管制规范，达成其日常生活的目的。

我对于新加坡复杂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地景的田野研究鼓励了我去探讨被动与受压迫公民的刻板印象特征，这些公民是面对着高压的威权主义，特别是李光耀。我的论述的确和对于新加坡的宗教几不同，也和认为新加坡的国家控制过度决定了个体的生活、导致了驯服的、可与测的、甚至没有能动性的行动者这样的论述是相反的。

透过威权国家的观点，学术和非学术的论述总是相当有信心且确定，不论说新加坡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这点，或是说接下来要被揭露的是可以预测地既无趣又不鼓舞人心。关于新加坡的研究继续和新加坡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的诠释抗衡，并且被过时的看法所影响。的确，当我呈现出一种另外对于新加坡社会的看法的时候，人们会解读成我是威权国家的辩护者，或是被说是满足于描述“微观”的日常生活被臣服的公民的胜利、却没有认识到“宏观”的政治机器霸权宰制。

因此，新加坡的社会学家有很多事情要做，必须不只是生产对于官方、霸权的关于新加坡会论述与解释的替代诠释，也必须去处理那些总是犬儒的对于新加坡社会的社会学想象与诠释。要超越陈腔滥调和公式化的论述，迈向多元、另类替代的想象，对于社会与政治的需要必须看成是挑战与野心。社会结构不是被个人所形塑的。而结构也不会一夕之间消失。真正的问题是：在现任总理李显荣之后，新加坡的政治地景将会是什么？■

来信寄给 Vineeta Sinha
<socvs@nus.edu.sg>

> 多元文化主义之后

Noorman Abdullah,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SA感知与社会主题小组(TG07)成员



在Telok Ayer历史遗迹的马来和印度雕像，为于新加坡的华人城区。Daniel Goh摄影。

李显龙在2016年8月国庆节的庆典上演讲讨论了新加坡的种族关系，并且希望弱势族群可以有更多的政治代表。弱势，在这个脉络下而言，特别指的就是种族，不是性别、不是性倾向，也不是任何其它社会群体。有趣的是，在1989年，其父亲李光耀坚持新加坡还没有准备好有一位非华人的总理，而2008年的时候，李显龙说这有可能但不会马上到来”（The Straits Times, 2008年11月9日）。讽刺的是，国庆节的两周后，新加坡的主要英文报纸The Straits Times刊登了一篇名为“谁会是下一位新加坡总理？”的文章（2016年9月4日），报导中所有人都是华人的内阁成员。

李显龙的演讲揭露了一个持续的种族化新加坡社会。种族的重要性和能见度从没有被低估，并且够过社会、政治、文化政策而增强，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相当重要？这样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之霸权表述是从新加坡的多元种族文化模型中长出来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其他人”的类别就是官方的CMIO架构，并赋予每个种族自己的文化和语言。

以英国的殖民主义为基础之上，CMIO多种族文化主义和精英统治一起建构了意识形态信条，形塑了这个从1965年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

的国家，这是一种驱逐，是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对于保留华人和其他弱势族群的权利所产生的分歧所导致的。这架构变成了后独立新加坡国族建构的必要一部分：去保护和正当化新加坡作为小城市国家的生存，以及对对不同族群和宗教团体的尊重。这样的种族架构也被一致地转译到教育和语言政策、自我成长团体、公共住宅分配、人口控制、政治代表之中。

新加坡宣称是一个种族中立的政府，国家平等地保护种族界线与关系，这是国家的利益所在。但是同时却有政策允许政府去推动特定种族的更多人口生育。这个种族计算术矛盾地确保和维持了华人的多数优势地位。当时的副总理以及后来成为总统的王鼎昌进一步宣称对于某个特定族群的优惠并不违宪。事实上，多元种族文化主义的论述虽然给予不同文化平等地位，但也让某些文化比起其他更平等。

然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去管理文化差异的预防方式，AMIO多元种族文化主义试图去模糊掉和削减社会上有意义的族群、地域、语言、宗教、文化的不同，并塞入观分的分类别中。这也加强了CMIO种族的界线，并透过认知、庆祝、卷绕进行着。种族或是延伸所谓的文化是被认为是政治和治理的类别，并且也被以本质主义、有边界的、内部同质的方式去对待、分类、制度化。

此外，批判的对于文化惯习的讨论通常被维持种族包容和和谐的努力而包围。包容是透过疏离和把忍受被建构成不方便的事务而持续着的。另外一方面，也存在着最小程度的对于跨文化对话、互惠尊重、合作的强调，以及多元文化的兴趣和好其延伸到了更深层的理解、知识、同理、接受差异的价值。这样的结果只是一种没有超出官方描述的文化差异的种族和谐。

然而同时间，另外在后独立的新加坡的日常生活可能和想象和更复杂的种族、差异、多元文化的互动代表了是非常有潜力去超越国家介入与由上而下的规划的。这些常生活跨文化实做是再没有外部的介入的情况下有机浮现的，伴随着文化的跨界和种族的跨界，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人们是在一般的交流中与文化差异与变迁进行处理、协商、互动。

>>

而日常生活的丰富肌理与内容是对于研究文化惯习在缺少国家高压的介入下如何抵抗和超越制度化的种族及文化类别的试金石。在宗教领域，这种边界的协商已经被透过过程，像是综摄(syncretism)、混合和便型、组合和搭配等而被理解。印度教和道教在信仰、实践、空间、仪式等场域已经混合了。寺庙或许可以很简单去被辨认成道教或是印度教，但是道教家庭可能包括了奎师那、鸠摩罗、象头神，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观音、如来佛等这种神明。这样的组合与搭配显示了信仰主动地选择了不同的宗教去进行实践。马来穆斯林族群和华人可能都回从双方的精神信仰领域寻求精神生活的指引。

相似地，代表性的族群食物 - 喇沙(laksa)，鸡饭(chicken rice)，啰喏(rojak)，马来炒面(mee goreng)和其他食物，都呈现了烹饪料理的借用和混搭，虽然特定食物通常被官方“误认”是不同CMIO种族的代表。

在语言的领域，每日使用新加坡腔英语的有机浮现打破了简化的CMIO种族分类和语言。作为口语的英文克里奥，以及融合了华人方言、马来语、泰米耳语等地方方言的语言，国家对于新加坡腔英语的暧昧在“讲好英语”的官方运动中可以清楚看到。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研究了那些在不同界面下浮现的互动、相遇、经验的。这些事物是在日常生的宗教、食物、语言、感知、电影、游戏中形塑而成的。这样的文化惯习打破了本质论的和相互排斥的界线，这些界线是被官方的种族分类所划定的。和种族问题的批判性互动、CMIO多元文化主义，由权力宰制而来的特权等，这些反映了想象新加坡并超越国家中心论述的挪用的可能。

今天，新加坡面对的是日益增多的移民涌入，加上在日益不平等的世界里面对都会的认同和新的期待。与其追求乌托邦的种族和谐，或是去打破种族分类架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

家应该鼓励新加坡社会里的不同团体去进行真诚反身的自我批判和认识到种族、差异、多元文化等的处境、限制、以及替代想象。透过这些努力，个体和群体或许会被鼓舞去思考、辩论、想象、建构有意义的新加坡认同，而这认同可以不同，并且可以被分享。这个视野需要把认识和行动，尊敬和质疑，共识和斗争结合起来，去形塑一个更批判、创意、多元文化的公民。■

来信寄给Noorman Abdullah

<socnoorm@nus.edu.sg>

> 精英统治过后

Youyenn Teo,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新加坡



当代新加坡越来越常见这种“特别加强”和“小班教学”的广告，Youyenn Teo摄影。

走进新加坡的任何一家购物卖场，你都会看到“特别加强”（enrichment）和“小班教学”（tuition）的中心，打着帮助小孩“在学校和人生可以成功”的广告，或是训练小孩知道“学习如何学习的艺术”，有些则教着和学校一样的东西——英语、华语、数学、科学、物理、经济——而还有其它更才艺的课程像是西洋棋和机器人。不论是学业与否，它们的目标都是让小孩可以“准备好升学考试了”。

这些中心的林立反映了新加坡教育体系的核心特质，也反映了社会阶层化的年轻化，早到甚至三岁就开始了。规律的阶层化给小孩不断的课业压力，所以这些补习班锁定了所有年龄层的小孩。学校倚赖的是标准化测验，所以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考试而准备。最后，因为很重要且竞争激烈，补习中心不是给失败的人，而是给想要往上爬的人。所以新加坡的额

外课业教育被认为是迈向成功的必要手段。

新加坡最常见的对于精英统治的批判是批评这个系统不按照应该的运作方式而运作。家长埋怨太多考试和作业。批评者则关心低社会经济阶级的小孩也该有相同的机会。但是很少人批评课外才艺活动的训练是有问题的。

在社会学的文献中，精英统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论功奖赏和胜者为王的系统。这有赖于狭窄的于什么是值得奖赏和什么不是的概念，并且这在 Bourdieu 所谓的“误识”存在下特别可行——公众相信系统是以某些原则运作的，但实际上则否。这个案例而言，新加坡体系奖励由父母继承而来的经济和文化资本，而非仅仅奖励辛勤工作。有这个阶层化的真正原则和机制之后，成功者会被正当化，被看成是努力工作和聪明的人，而不是因为他们继承了某些资源。精英统治也讲述一种特定的失败故事，那是因为个人的原因导致，不是结构性的不平等。

社会学来说，新加坡的教育体系是被设计好的。除了推动狭小范围的特质和把学生分类以外，公众诚心认为那些被奖励的特质是个人能力和努力的反映。那些有着很好学历认证的人，一路从好的途径晋升上去，有正式的认可，有安全的专业工作、学术业、民间行业、公职人员，被认为应得好的地位和薪水。这个门坎很高，有时太高了，但是回报不被认为是武断的。

批判的社会学观点在看待教育和精英政体的时候，很难获得共鸣。要了解为什么，首先我们必须研究新加坡社会的两个特征：个人主义的制度化和科技论述的重要性。

支持着精英统治的逻辑是被编织进日常生活之中的，并透过多重的国家制度和复杂的政策，形塑各种选项，影响了婚姻、养育小孩、家庭管理、养老和照顾病人的各种路径。这个逻辑是这样的：个人比须照顾好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而虽然新加坡国家介入了生活各个领域，但是却反对普遍的福利措施。个人的技能和认证取得、继续就业、异性恋伴侣等都是取得公共才和福利的前提，这些资源包括了住房、健保、小孩照顾等等，若无法取得那些前提条件——学历、工作、婚姻、后代（形成循环）——意味着没有安圈、福利、社会身份。取

>>

得个人的“成绩表现”因此是取得上述资源的重要前提，而且核心家庭是基本的社会经济与政策制定的单位—伴随着跨世代的相互依赖。因此，家庭的投资对于取得良好成绩是可以理解、甚至必要的。

第二，精英统治是被强力的民族和特定自我的科技论述所支持的。新加坡的精英政体是和马来西亚讨好与歧视特种族的体制不同的。精英统治—理性、系统、无关个人的一—已经被赞为是新加坡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成功、奇迹的国家生存的根源。这个国家进步的论述可以在那些“造就”这个进步的人士的传记里面看见。像是 Pierre Bourdieu 的法国，“国家精英”—那些被世界顶尖大学认证的“该被赞扬”的人—就占据特定说话且人们会听到的位置。从政治精英和政策制定者的办公室，记者和大学教授的桌上，这些人从有限且特定的角度去看整个系统：这个系统虽然不完美，但是可行，因为他们都是精英。那些鲁蛇的失败故事是被消音的，孤立的，臣服的。精英是个好体系，因为那些反对的人没有占据有力的发言位置和没有资源去批评之。

精英统治的代价是很高的。低薪的家长、那些不能给小孩良好资源的人，就得负起较高的代价去取得物质或是象征的资源（稀少性）。而社会的不平等恶化后，收入高的人也可能要付出代价，会去害怕即使一点点的向下流动也可能意味着很大的损失。而大量昂贵的教育产业、年轻人的忧郁和焦虑、家长的压力、叮咛小孩写功课浪费、不平等的恶化等等，这些都是代价。

社会学家可以做什么？我们需要研究计划和行动纲领。

就研究来说，我越来越可以确定的是教育社会学是不能和家庭研究、福利、国家社会关系、政治等分开来看的。为了理解精英寡头统治，我们必须用上所有的研究工具去研究，包括了深深理解为什么从一方面来说是个非理性的行为（如私领域的昂贵教育投资）可以帮助理解其他领域的问题（像是家庭主义式的反福利政治）。我必区去处理这些问题，并且不能简单的从教育的观点来看，还要看不平等以及牵连的再生产各个面向。

此外，若社会学的工具可以去在公共关于精英统治的对话中得到支持的话，我们还要去

断裂主导的言论。解构那些主导性的论述需要自我反身性作为前提。学者必须要有意愿去超出思索精英统治和不平等作为仅仅是研究主题的方式，还要去检视自身的特权和我们让不平等得以持续的各种论述和日常生活实做。断裂主导论述也需要和学院之外的观众对话，作为一个学科，若我们已经有了了解特权和不平等再生产的批判工具，那我们就必须要在传播这些想法到象牙塔之外这点上做得更好。这可以透过写作、演讲、讨论，也透过和公民社会、教育者、政策制定者、家长的互动而得以可能。

来信寄给 Youyenn Teo
<yyteo@ntu.edu.sg>

> 世俗主义过后

Francis Khek Gee Lim,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新加坡



在一个公共住宅内的家庭寺庙的信徒，Francis Lim摄影。

在许多方面，作为一个新加坡人意味着，不论公私领域，必须持续不断地和国家所强加的社会分类系统进行协商。当然，所有的现代国家都试图去定义、限制、管理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这毕竟是国家建造和治理的基本工具。新加坡人持续不断地要去对三个标签进行协商：种族、语言、宗教，他们是国家神话的基本论述主题，也是国家试图去进行社会和政治控制的基本治理工具。

当每个学生重复每日的“不论语言、种族、宗教”都去“效忠”一个统一的民族的时后；当每个公民必须在身份正上注明他们的“种族”时候；当弱势族群权利和宗教和谐维护法案（1991）成为新加坡多元文化的基石的时候；当基督徒被因为太过于热衷要人改宗而被入罪的时候；当一些“自我激进化”的穆斯林必须按照国际安全法而因为有恐怖攻击的计划被拘留的时候；这些时候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看到新加坡的种族、语言、宗教深深的绑在一起并且政治上相当有争议性。

对于新加坡政府来说，世俗主义被认为是这个国家多元宗教和族群可以和平共存的基础。任何关于新加坡宗教与族群的社会学研究必须首先认识到新加坡是一个多宗教的社会、政府是个世俗政权的这样一个事实。新加坡的宗教多元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历史结果，包括了之前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殖民地而吸引了许多亚洲和之外的人前来。而世俗国家的推动是从国家有意识地进行意识形态工作而开始的，这也受限于当时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出来

的时候的环境，此外也由于政治领袖想要形塑一个民族国家认同，这个认同必须和邻近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文化有所区隔。

对于一个世俗国家来说，很令人惊讶的是新加坡有个穆斯林文化政府部门。在2016年的古尔邦节的时候，该部门部长警告新加坡人要拒绝有害融合的想法，并且提醒说宗教场合是个很好的时机去思考宗教和族群融合的议题。国家的公共政治论述中，伊斯兰总是被描述成他者，这个他者是对于新加坡作为一个世俗政权、也对链接到极端主义意识型态对于社会和谐可能的威胁来说，都是如此。

新加坡的强国加把人们分类排放到不同“种族”里面，而这个种族是透过文化差异，像是语言和宗教而决定的，所以关于族群和宗教的社会学研究通常采取两个取径。第一个是比较实证社会学的传统，把“种族”和“宗教”看成独立变相。第二个取径则批判地检视权力如何形塑了这些边界，探讨族群和宗教的划界如何可能位移和模糊，导致暧昧、混合、多重的认同，并且完全不同于那些整齐划一的分类架构。因此，关于宗教多元的新加坡研究发现许多印度教和道教的信仰者（分别从“印度”和“华人”社群而来）崇拜的神，包括曼尼瓦拉（Muneeswaran），福德正神，保生大帝，哈奴曼（Hanuman）等，都是从两个宗教传统来的，有的神明甚至都被供奉在同一个寺庙中。

对于世俗主义的批判研究指出了世俗主义可以帮助正当化新加坡的多种族文化，有助追求社会祥和，但是也强调了世俗主义对于政策

>>

制定中的“客观”和“理性”讨论的影响。新加坡的世俗主义不是反宗教的、军事的那种共产式世俗主义。反之，其承认了宗教对于人民生活的重要性，并且对所有的宗教平等，和宪法保障的宗教自由不同的是，新加坡政府鼓励各式宗教群体去贡献社会，特别是社会福利和道德与文化价值的推动。

新加坡世俗主义包括了两个基础面向。第一，国家政府坚持政教分离，禁止宗教群体进行政治动员。第二，政府控制和管理宗教，并透过设立代表作为宗教组织的“顾问”，提供咨询给宗教团体，像是新加坡伊斯兰委员会，以及寺庙、清真寺、或是信仰团体。这些顾问作为监督者，形塑宗教论述以符合国家的政策。

就像许多现代国家一样，新加坡法律上是认证让人们进行宗教崇拜的地点的，并且布署由发展意识型态和现代化所构成的领土性之功能概念。作为一个城市国家，面对着土地稀少的问题，政府拥抱了高度的功效主义和介入性的都市计划，当新加坡土地部从宗教团体取得土地之后，宗教团体会被迫离开，关闭。例如，若有华人寺庙被买起来去成立“结合寺庙”，不同供桌就会被放在同一个寺庙内。最近政府也提出要盖多层楼房去容纳不同的宗教活动。

许多宗教学者已经开始检视国家对于管理和管制宗教的策略，但是比较少研究宗教如何去规避相关政策。例如，Terence Chong, Daniel Goh 和 Mathew Mathews 研究福音教会如何细致地形塑政策和政治论述，并透过选择政治领袖去表达对于政府的性与家庭的保守政策之支持。研究印度教的学者，包括 Vineeta Sinha 对于曼尼瓦的研究，指出了森林里的仪式是为了不被政府监控。我自己的研究是看一贯道（华人而来的跨国“救赎宗教”）把公共住宅（官方的“世俗”地点）变成寺庙。同样地，基督宗教也会在家组织了“小群体”聚会，

而华人精神媒介或是道教也会形成“住宅寺庙”。

这些案例指出了新加坡政府对于宗教的管理的可能限制，这是由于世俗主义对于“公”和“私”的宗教领域之区别。这个区别可能开启了对于国家管制宗教之能力限制，也开启了宗教群体去在政府限制之外运作的空间。■

来信寄给 Francis Khok Gee Lim
<fkglim@ntu.edu.sg>

> 全球化过后

Daniel P.S. Goh,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



滨海湾的国家的国庆游行彩排，有个漂浮的舞台， Daniel Goh摄影。

有两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关于新加坡的国立博物馆和历史教科书。第一个故事是关于自从1965年的独立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Stamford Raffles从1819年起在这个岛上的殖民。这个故事中，Raffles是个天才，发现了新加坡的地理战略地位，因为位于马来半岛的下缘，就在印度洋和东亚的交会。英国的开垦有着很好的治理和开放的移民，所以屯垦从一开始的小渔村扩大到今天的国际都会。第二个故事是比较最近的，就是关于最早的屯垦区Temasek。以亚洲探险家的考古的根据来说，Temasek是个堡垒城市，也是一个国际的交易港口，在14世纪被三佛齐帝国的王子所建立。后来则被马六甲苏丹王朝于15世纪控制，之后落入葡萄牙人手朱，然后城市就被废弃了，回到了原本的梵语名称：新加坡(Singapura)。

两个故事的共同结尾是人民行动党，该党是自从1959年的执政党，当时的英国殖民者建立了选权和自治政府，也奠定了后来成功的基调。而共同的情节则是全球化不但是新加坡成功的基础，还是生存的依靠。全球化就是新加坡。因此，虽然新加坡1965年建立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非自愿地脱离马来西亚之后—执政党的S. Rajaratnam (对于这个新国家的建立是个关键人物)在1972年把新加坡称为一个全球城市。这个说法广被认为相当有远见，并且新加坡的确从一个商业都市转变成工业经济体，后来又成为了后工业城市，是亚洲的重要

财金枢纽。

但是Rajaratnam的洞见不是一个受期待的关于新加坡如何在政治经济的需求下成为全球城市的论述。他利用了Arnold Toynbee的想法，做出了一个后黑格尔启蒙的论点，说新加坡是一个全球城市。而新加坡必须成为且发展成全球城市，好让这个论述实现，达成历史目标。因此，在经济上吸引跨国公司、在移民上保持开放，这不仅是务实的经济生存之道，也是让新加坡持续成为全球城市的基础。

国立新加坡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社会系成立于1965年，是现代化努力的一环。过去50年，特别是早期，该系人类学和社会学家多数在西方最好的学校受过训练，并且都参与了政府的社会政策制定。这包括了帮助多数人到公共住宅，管理族群和宗教多元主义，应对婚姻和生育议题，以其其它政府的社会工程和现代化工程所出现的问题。

今天的批判学者或许把这个看成是社会学家与执政党共谋去打造一个霸权意识型态。但这是太过于简便的后见之明论调。独立后的年代，任何的新加坡人或是对后殖民新社会有同情心的人都会支持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这个是被Rajaratnam这样的思想家所深刻提出的。况且当时是缺乏另外的替代论述的，没有替代论述去说新加坡如何晋身国际社会，并且这是在去殖民时左派失败之后，是在选择性的采纳社会主义政策之后，并且这是在被执政党拿走了可以链接共产国际的元素之后。

1990年代新加坡社会学有了重大的变化。转折点是1995年Chua Beng Huat的书《Communitarian Ideology and Democracy in Singapore》的出版。他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拆解了，并命名之。后来Chua又出版了研究公共住宅的书(1997)，其论证超过新加坡五分之四的人所居住的公共住宅是新加坡社群主义的物质化基础，这把所有人都整合到执政党所打造的经济体里面。这不是一种专制意识型态，而是若从葛兰西的理论来看，是一种日常生活对人民产生极大影响的霸权。新加坡的新生代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为了响应这个理论，便视图去找出替代的论述和研究的方式。本期前四篇文章种指出了这点。

重要的是，这样新加坡社会学的转变是

>>

发生在Rajaratnam的全球城市变成了Saskia Sassen的笔下的全球城市。而政府也拥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重塑经济，加速资本积累、商品、迁徙的速度。新的词汇出现了以连接词“与”形式而成的二分法。市民被要求要“国际化”和“中心地人民”(heartlander)，去自信地在世界各地旅行但是又舒服地以地方的公共住宅为家。整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且是一个全球城市，不再是这个民族是个全球城市。而这样的多元也被快速的移民、多族群、多元文化所加速了。1989年，南亚研究院(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出版了一本指标性的书：《Management of Success: The Moulding of Modern Singapore》，这是由两位地理学家主编，包含了许多第一代的新加坡社会科学家的文章，回顾新加坡的成功资本主义和亚洲四小龙的地位。2010年，该院出版了《Management of Success: Singapore Revisited》，是由社会学家Terence Chong主编，这本书试图去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紧张关系。

若全球化就是新加坡，那是全球化后的新加坡社会学会是什么？有三种可能：去乌托邦，乌托邦，启示。后见之明来说，我在2010出版的《Management of Success》一书中有一篇文章，就是一种去乌托邦的取径。该文检视了政府如何尝试把新的多元族群文化融入旧的多元主义之中，为的是去管理由移民带来的新的多元性以及解决经济不平等造成的族群紧张关系，并且在政治上仍然掌握大权。这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紧张则进入了现代化的矛盾之中，没有办法消解，唯有靠强大政府去管理。这是个涂尔干的架构，问题从多元社会的情感连带开始，并以只有仰赖政府去整合社会与管制这样的悲观论调做结尾。而延伸的意思就是说，寻找代替的实践与论述是有用的，因为国家必须更新其道德的保护责任，并透过采取这些替代的实践和论述整合到文化中才得以可能。

第二个可能性是乌托邦的，这出现在这期的文章里面。这个取径唤出Thomas More的乌托邦式的追寻，追寻社会、政治、宗教的理想共和传统，建立在一个有着完美人口的岛屿上，并有着民主与平等。这样的强调是最小程度上倚赖政府的，并希望留给个人自由和成就的空间。人们会是经济上有创意，社会上善良，政治上参与的。对某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对这些新加坡的希望空间的发现和分析，虽然有时必须透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但是是足够的。这里的信念是这样的故事会启发大学生，以及一般民众和杰出的人，去行动，去改变生活世界。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就像Youyenn Teo本期文章里所指出的一样，他们

会要求去让学术的行动主义把这样的故事带给更广泛的群众，社会学则因此变成改变的催化剂。

重要的是，乌托邦的取径虽然会被执政精英出自忌妒这样的意识情态影响力而反对之，在政治上既非反对也不激进。这个取径是和Rajaratnam全球城市一样的，因为他在1972年的演讲中说要“让我们的人民有智识和精神上的能力去建立一个全球城市，变成一个先知梦寐以求的天堂国度”(The Straits Times, 1972年2月7日)。总之这个取径可以追溯到圣奥古斯丁。

最后一个可能是启示的取径。这在政治上是很难以维系的，因为新加坡的政治向来保守。但是在知识上，以及在政治上是必要去思考这个取径所提出的问题的。若是全球化就是新加坡，那全球化反转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在1920和1930年代已经出现过，也是这个时候英属马来亚的左派和族群民族主义者二战后的去殖民时代的激烈暴力斗争奠定了基调。结果暴力冲突产生了三个政治实体，这是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马来亚联邦，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共和国。这些实体转变了当地社会，且出乎意料之外。什么样的未来是今天无法想象的呢？若预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新加坡社会何去何从？当全球化退潮，新加坡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来信寄给Daniel PS Goh
<dsong@nus.edu.sg>

> 不自由的未来

反对性别主义和反全球化

Agnieszka Graff, University of Warsaw, 波兰, Elżbieta Korolczuk, Södertörn University, 瑞典, ISA女性与社会(RC32)和社会阶级与社会运动(RC47)委员会成员



反同性恋的海报，2015年8月30日。Elżbieta Korolczuk摄影。

全球政治里，性别是重要的。在美国总统大选过后，我们对于这点是再清楚不过了：川普的大男人沙文偏见可以受到广大的支持，这只不过是问题的一部分而已。在美国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民粹主义不仅仅是诉求不稳定与害怕，也诉诸于性别关系、（同性恋）性倾向、生殖而来的焦虑，在每个国家里，保守

人士所批判的“性别”或“性别主义”，包括性别平等政策，性教育，LGBTQ及生育权利，这些都帮助动员了许多女性和男性，让民粹政治领袖得以抬头。虽然对于女性主义和性别平等政策的反对不是新鲜事，但是现在的浪潮标志了一个从之前新自由主义典范而来的不一样的典范：社会保守主义。社会保守主义现在很明显连

>>

结到了对于全球资本的对。

波兰 2015 年右翼民粹政党法律与正义党的大选胜利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居然在保守媒体和宗教论述中诉求反对“性别主义”。从 2012 年开始，波兰的天主教会和保守团体已经开始采取了许多行动，反对在政策制定中使用“性别”的字眼，反对性别平等的教育和立法（像是签署伊斯坦堡会议对于防治加诸于女性的暴力的公约），并且试图去限制性权和生育权利。这些行动包括了天主教会的领导，保守政客，右翼智库，反堕胎团体。其他团体也加入了，例如，一个家长的草根团体“拯救下一代的小孩！”(Ratujmy Maluchy!) 从一个 2009 年反对教育改革的战场中出现，加入了反对伊斯坦堡公约的战役，认为会危害到父母的权威，特别担心小孩会受到那些“同性游说团体”的威胁。那些反性别主义的人士宣称要保护小孩和家庭，还有波兰的宗教和文化价值，反对女性主义和同志团体与人权团体，认为那是被自由派贪腐政客所支持的。在那些反性别主义的论述里面，当时的政党“保守自由公民党”被描述成是极左派，也被认为要结合外国势力如欧盟摧毁波兰民族和传统价值。

在这些保守的公集中，“性别”并不是一个用来讨论性差异和分析男性或女性气质之建构的标签。相反的，性别是一个国际主义的阴谋，从性革命开始，用一种共产主义式的方式强迫人们接受。联合国或国际跨国资本是支持这个阴谋的代表，而且性别主义者要推动

堕胎，让道德堕落，推动自由主义，摧毁社群和传统家庭。而且运动的目的是强加武断的性别改变给那些小朋友。总之，“性别”这个概念持续和性差异的取消有关，并且造成性倾向的混乱，让世界一些地方人口减少。

反性别主义运动不只是在波兰发生而已。类似的论述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在俄国，宣称同性恋和性别平等运动是威胁在地传统价值的论述让普丁的支持度更加强了。法国的反同志婚姻则让右翼的民族阵线支持度上升。美国，川普的沙文主义并没有阻碍了其总统路，选民也并没有被选出第一位女性总统的诉求而打动（53% 的白人女性投给川普）。所以，连结右翼民粹和反性别主义的东西是什么？两个意识形态的交会不只是在社会保守价值的维护而已，也对准了自由派的精英，要他们对社会和经济的问题负责。

我们发展出了一套分析，这是透过许多合作的计划去看欧洲的反性别主义运动以及运动者的经验。我们分析了许多文本：重要反性别运动人士的书籍、文章。我们也访问和看公开的声明（包括了两位教宗、在地的天主教领袖、知识分子），媒体报导，反性别主义事件，其网站发表的各种文件（波兰的 www.stopgender.pl、国际的 www.citizenngo.org 或是 www.lifesite-news.com）

所有的反性别主义的文本都指出了来自自由派精英、女性主义者的危险性。而这些反对者则声称代表了一般人民，辛勤工作，爱护家庭。重要的是，一种潜在

的受害者认同是混合了经济和文化元素的：性别主义者被认为是有钱且和全球精英连结的；而一般人民则是受到全球化的危害。这个文化和经济的交织连结可以在反性别主义的论述中清楚看见：使用保守版本的反殖民论调。性别主义被认为是外国的加诸，是殖民，被用来和威权与恐怖主义做比较。这个论述其实和对于西方殖民主义的辩论是脱勾的，但是，这却一直被用在没有被殖民的国家，像是波兰。在所有的民粹论述中是反对腐败的国际精英，因为他们剥削一般人民还有民族，让他们暴露危险之中。

这个反性别主义的一个例子是当时波兰的司法部长 **Jarosław Gowin**。他在 2012 年大力反对伊斯坦堡大会共识，说是“性别主义的载体”，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特洛伊木马，为的是要让在地价值和传统家庭消失。同样地，2016 年 1 月，教宗警告说“性别意识形态”是危险的西方富裕国家的价值，外国援助和教育都推动性别平等政策，但是“善良茁壮的家庭”可以抵挡这些威胁。

在他们对于“性别主义”的描述中，右翼基本教义派把意识形态殖民和经济权力链接了，他们被看成是国际的企业和机构的阴谋。波兰的许多保守派把矛头指向欧盟，其他的国际组织也成为箭靶，像是全球对抗爱滋、结核病、疟疾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波兰的脉络中，反性别主义也对准了公民社会中的机构，像是被西方所资助的团体，如 LGBTQ 权利团体、反恐同阵线 (KPH) 等。这些

组织被看成是跨国腐败精英的同路人。像是一位主要的反性别主义者 Gabrielle Kuby 在一篇访谈中所说的：

这个全球性别革命是由全球的权力精英所执行，包括了全球组织像是联合国、欧盟，以及全球大企业，像是亚马逊、谷歌、微软。大基金会像是洛克斐勒和古根汉等。富豪像是比尔盖兹、泰德透纳、乔治索罗斯、华伦巴非特等。非政府组织像是国际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和国际 Lesbian and Gay Association。

尽管对于“在地”和“代表性”的价值的强调，反性别主义的运动也被跨国的网络像是世界家庭大会 (World Congress of Families) 和 CitizenGO 等支持。例如，波兰的 Ordo Iuris 和欧洲青年联盟 (World Youth Alliance Europe)、美国天主教家庭人权协会、布鲁塞尔的欧洲尊严监督组织密、英国保护未出生孩童协会等密切合作，尽管这些跨国连结的存在，反性别主义人士还是用反全球化的语言，强调人的尊严，强调家庭价值

和保护儿童，这些都成功地唤起人们的焦虑情感。

保守人士已经开始去巩固那些对于新自由主义和政策所造成的经济不稳定和焦虑感了，这些焦虑被引导到反对精英或是在波兰被描述成背德的“欧洲愤青”（一个极右派的口号是：“恋童癖：看看这些欧洲愤青”）的愤怒，或是在美国的“腐败希拉里”。新的反性别主义的浪潮建立再反对性别平等政策，这可追溯到 70 年代，但这也反应了跨国对于非自由的民粹和民族主义的抬头。其把性别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及文化与经济剥削划上等号，这个策略开启了非自由民粹的成功道路。反性别主义已经变成新的保守语言，用来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来信寄给 Elzbieta Korolczuk
<bekorol@gmail.com>
和 Agnieszka Graff
<abgraff@go2.pl>

> 在波兰捍卫 生育权

Julia Kubisa, University of Warsaw, 波蘭



波兰女性在Warsaw抗议新的堕胎法案。2016年10月3日，Elzbieta Korolczuk摄影。

在2016年的秋天，有一波女性的抗议爆发了，目的是为了反接下来可能要把堕胎入罪化的行动。波兰女性主义从1993年就开始抵抗反堕胎法案，而波兰的法律是欧盟里面最严格的，只让乱伦、强暴、危害健康性命、胚胎基因变异的案例下可以堕胎。

而波兰的社运者已经指出，这种法律限制已经导致了地下的堕胎，但是这个议题要直到2016年才被广泛瞩目。在波兰的2015年国会选举之后，右翼的法律和正义党成为多数，所以限制堕胎的立法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在2016年的时候，政府领导者，包括首相 Beata Szydło 在内，释放出讯息说要支持完全禁止堕胎，而且极保守的 NGO 团体 Ordo Iuris 则开始联署要推动立法把堕胎的女性和医生送入大牢，并要政府确定那些流产案例不是被堕胎药物所引发的。

而 Ordo Iuris 所引起的愤怒迅速的导致两个社运的产生，这些示威抗议，主要由一个草根的女性主义团体 Girls for Girls 和立法游说团体 Save the Women 所发起，她们主要是社会民主女性主义者，为的是解放波兰的反堕胎法。

在2016年中，Ordo Iuris 宣布已经收集到了超过50万的签名，而 Save the Women 则收集了25万。两者的请愿都被送到国会，右翼天主教组织已经送过好几次类似的请愿了，但是支持堕胎的请愿在90年代之后这次是第一次，因为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120万的签名请愿被拒绝了。

这次国会又马上拒绝了 Save the Women 的草案，但却继续讨论堕胎入罪化的提案。这个作法让 Save the Women 和左翼 Razem 党相

当气愤，上街抗议。他们要求支持者身穿黑衣加入示威，或是自拍把照片放上网络，也用#blackprotest当作标签。当波兰最受尊敬的女演员建议一场全波兰女性的罢工，这是仿效1975年的冰岛女性罢工，社群媒体上的运动者马上跟进，宣布10月3号是全波兰女性的黑色罢工日，虽然这场运动不是由女权团体所发起，但是许多的相关人士和政治人物都响应，捐赠物资等。在罢工之前，许多女性告诉上司要休假一天，为的是响应这个罢工。许多大学也停课。

尽管有各种阻碍，像是罢工的法律地位等，这次还是很成功的，因为动员能量可说前所未有。不像其他城市或首都的示威抗议，这次女性罢工是不分城镇的受到支持。女性和女孩，以及一些男性在全国142个城镇乡村组织动员，超过了15万人，全部都穿黑衣。口号都是关于女性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女性尊严，这些都和禁止堕胎抵触。因为罢工那天下很大的雨，许多人撑伞，所以也变成了抗议的象征。

罢工的规模和能量让执政党以及天主教会非常惊讶。但他们的第一个响应是充满性别歧视的：天主教宣称女性被强暴不会怀孕，一个民粹政客说女性性伴侣很多，要被控制，而外交部长则称女性完全不负责任。然而，抗议三天之后，国会否决了完全禁止堕胎的提案，这是执政党的少数失败。

政府放弃了对抗的修辞，反而采用“软性”的方式，像是总理宣布波兰女性若经历“困难怀孕”——困难指的是无法治愈的疾病或是胚胎有问题——可以得到一次性的1000欧元，这是为了给那个出生即将夭折的婴儿的补偿。这个法案已经被介绍给大众了，但是反对者认为这是物化女性。

许多参加全波兰女性黑色大罢工的社运者决定继续奋战，所以政府会持续受到压力。两周之后，她们组织了另外的罢工，规模较小，但是制定出了十一点行动纲领，推动女性尊严和自由，反对对女性的侵害、家暴、社会军事化，并要求以女性为出发点的社会政策。而黑色大罢工也启发了至少两位名人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堕胎经验，打破的禁忌。大众有58%支持黑色女性大罢工，可说相当有群众基础。

这次罢工也得到了广泛的国际瞩目，像是启发了阿根廷、冰岛、南韩等国的女性去组织类似的抗议。Save the Women的Barbara Nowacka和Razem的Agnieszka Dziemianowicz-Bak获奖为2016年的全球思想家，这个奖是由Foreign Policy杂志所颁发的，其两位代表了波兰女性黑色大罢工运动。

波兰政府已经继续其软性的说服工作，并且放弃提及堕胎的限制，反而用支持那些出生带有先天残疾的婴儿的论述。但是政府并没有实际上真的增加资金给这些案例补助。不过女权团体继续反抗，最近，当卫生部长要降低生产和女性照顾的医院的标准的时候，以及执政党说要拒绝欧洲伊斯坦堡委员会所要讨论的女性家暴议题的时候，女性团体说：“我们可是不会收起我们的雨伞的！”■

来信寄给 Julia Kubisa
<juliakubisa@gmail.com>

> ISA的青年社会学家网络

Oleg Komlik, Ben-Gurion University, 以色列, ISA青年社会学家网络会长



| Arbu繪。

ISA青年社会学家网络 (Junior Sociologists Network; 以下简称 JSN) 旨在把学生, 年轻学者, 相关科系学者等, 不论兴趣或方法取向, 都连结起来。这篇文章我会简介 JSN, 说明这个特殊的国际社群如何推动其会员的专业发展, 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学作为志业。

从2006年开始, 由于受到ISA会长们和执行委员会的鼓励, JSN从一开始的鼓励ISA博士实验室计划的学生、ISA青年社会学家竞赛、以及各界世界大会的规模演变成今天的网络。这个社群的成员都是在地扎根、全球连结的。这是一个很棒但是也充满挑战的尝试。我们看到了潜力, 所以想要实现这样的理想。JSN的目标是提供青年社会学一个分

享信息、交换想法、开启合作的一个平台, 让他们可以发展生涯, 并且创造、传布、应用社会学的知识。

过去两年半来, 我们看到了JSN相当令人兴奋的成长。我们努力把这个信息传播出去, 特别是全球南方, 所以JSN的会员已经有2500名硕士、博士候选人、青年、资深社会学家了。虽然多数是学术人员, 但是也有运动者和非学术的相关人员加入。我们欢迎所有那些认为社会学是其工作一部分的人。

JSN的活动主要是以四项为基础。第一, [电子邮件名单](#)成为了受欢迎的信息传递来源。每两周JSN的通讯会提供有用、有趣、相关的消息, 像是征稿、博士后名额、奖助公告、征才、以及激荡想法的文

>>

章。

第二，ISA 的博士论文摘要库是一个开放的数据库，让青年社会学家可以放上自己的博士论文摘要、个人简介、联络方式。现在已经有 650 份摘要了，透过帮助参与者发现主题，这个平台开启了合作的机会。此外，出版社也会浏览这个数据库，并且联络作者。

第三，JSN 有自己的[脸书页面](#)以及[推特账号](#)。上千名的跟随者和造访者可以透过张贴公告、博士论文摘要、有趣链接等去帮助传递信息。

第四，JSN 很骄傲地保有了共同主办斯洛文尼亚社会科学国际会议的传统，也支持其他学术会议，把青年学者从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

我要谢谢 JSN 委员会的成员 Dolores Modic 和 Tamara B. Valic 的投入，以及 ISA 的秘书的协助。我要利用这

个机会说，JSN 永远会聆听建议，任何想法和帮忙都会相当珍惜的。

JSN 和 ISA 的其他重要计划和研究委员会一起帮助建立一个社会学的全球社群，然后去解构社会政治的语言迷宫。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化以及威权和民族主义盛行的年代，我们记住了社会学作为志业的重要性。我希望可以去进一步传递这个珍贵的社会学的火炬。■

来信寄给 Oleg Komlik
<komlik@gmail.com>

> 翻译《全球对话》 成印度尼西亚文

Kamanto Sunarto,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Depok, 印尼

2015年4月一群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学家组成了编辑团队，着手翻译《全球对话》的第5卷第3期。那是第一版的印度尼西亚文版本，共有16国语言，于2015年9月出版。

这个团队包含了9为社会学家，分别在5所大学、4个城市：在Depok的印度尼西亚那学(University of Indonesia)，在Yogyakarta的加查马达大学(Gadjah Mada University)和圣那塔达玛大学(Sanata Dharma University)，在Bogor的波葛农业学院(Bogor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以及在Kupang的塔鲁玛迦大学(Nusa Cendana University)。另外还有4位成员是就读于澳洲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巴黎高等社科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阿母司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 Amsterdam)、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的博士候选人。

有3位成员组成了编辑委员会，负责审查翻译稿。委员会成员也翻译文章，特别是当其他翻译者没有时间的时候进行。同时，成员也审查其他的翻译稿。此外，一位委员会担任像是总编的职位，另外会有一位担任通讯联络员，最后还有一位负责和《全球对话》的管理团队接洽。一位大学生负责协助编辑、设计、制成印度尼西亚文版本。

在《全球对话》发行前一个月，编辑委员会会联络每一位翻译者去翻译1到2篇文章，取决于他们的时间。因为每个人所属的学校距离很远，从67到2770公里不等，所有的联络都以电子邮件或是社群媒体进行。

而印度尼西亚编辑团队遇到的挑战，其实和6.3期的罗马尼亚团队所遇到的是大同小异的(2016年9月)。除了基本的英文和印度尼西

“许多基本的概念还没有被翻译。”

亚文的语言结构不同之外，许多基本的社会科学概念也没有被正式翻译，所以许多学者就以英文原文呈现。而编辑委员为会查字典，查期刊，讨论，甚至会咨询专业人士或是原文作者。

在同侪审查所有的翻译稿件之后，会开始联络每一位去解决问题，而委员会会去确认ISA的准则，然后确定一切无误之后把最终稿件交给《全球对话》的主编。

在ISA把《全球对话》刊登在网络上之后，委员会会把连结寄给印度尼西亚社会学会(ISI)、印度尼西亚社会学研究计划协会(APSI)、各系所、图书馆、研究中心、社会学学生组织，以及各大学的社会学家。■

来信寄给 Kamanto Sunarto
<kamantos@yahoo.com>

> 介绍印度尼西亚编辑团队



Kamanto Sunarto是印尼大學(University of Indonesia)的社会系、社会与政治科学系的退休教授。他1980年从芝加哥大学得到博士学位，现在的兴趣是高等教育和社会学的历史。他是ISA的教育社会学(RC04)和社会学历史(RC08)研究委员会的成员。



Hari Nugroho目前是一位在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文化人類學和發展社會學的博士生，以及在印尼大學社會學系的講師，社會政治學的教授。他獲得荷蘭的伊拉斯姆斯大學(Erasmus University)的社會研究院的碩士學位。他的研究興趣在勞工、社會運動、本地政策和社會不平等。Hari是ISA勞工運動(RC44)、社會階級和社會運動(RC47)，以及社會運動、集體行動和社會變遷(RC48)研究委員會的成員。



Lucia Ratih Kusumadewi是法国巴黎的高等社科院(EHESS)的介入社会学分析中心(CADIS)的博士生。她2006年拿到EHESS博士先修生(DEA)学位，现在是印度尼西亚大学的社会与政治科学系和社会学系的讲师。主要兴趣是社会运动，认同、宗教、青年、教育。Lucia也是ISA宗教社会学(RC22)和社会阶级与社会运动(RC47)研究委员会的成员。



Fina Itriyati是是印尼Yogyakarta的加查马达大學(Gadjah Mada University)宗教與文化研究所的講師，現在在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艺术和社科院读博士。其研究计划叫做“The Biosociality and Redefinition of Identity of Newly Disabled Women in Post-Earthquake Indonesia”，其使用民族志方法去了解残障女性经历灾难后的日常生活。她对性别、文化、社会、体现、残障、灾难、人权等议题。Fina也是印度尼西亚社会学社和ISA社会科学中的身体研究委员会(RC54)的成员。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是印尼大學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社會系的講師，社會與政治科學系的教授。她的研究領域是社會階層與流動、社會不平等、貧窮與教育社會學。Indera 在印尼大學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以及在美國州立密西根大學獲得藝術碩士。她是 ISA 的教育社會學 (RC04) 和社會階層化 (RC28) 研究委員會的成員，同時也是印度社會學學會成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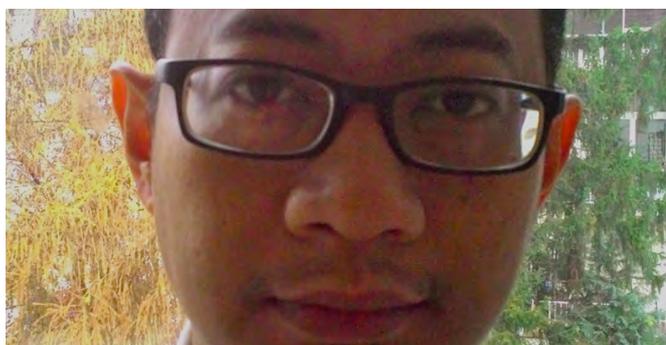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是印尼的聖那達瑪大學 (Sanata Dharma University at Yogyakarta) 宗教與文化研究所的講師。他也是一位在當地非營利組員 Sahabat Insan 工作的研究員，該 NGO 是研究移工議題。他在 2007 年完成哲學碩士，並且在 2011 年獲得英國牛津大學 (Oxford University) 研究發展的博士學位。他的主要研究興趣是在勞工運動、移工、認同政治及地下經濟。



Mohamad Shohibuddin 是荷兰阿母司特丹大学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的社会系博士生。他也是印度尼西亚的葛农业学院 (Bogor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传播和社群发展系的讲师。他是萨九友 (Sajogyo) 学院的执行长，这是一个聚焦贫穷、乡村发展、农业变化的机构。其研究兴趣包括土地改革政策、乡村研究、和平和冲突、乡村社会运动。



Dominggus Elcid Li 是资源治理和社会变迁学院 (IRGSC) 的执行长和研究缘。他 2014 年从英国的伯明翰大学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取得博士，并在美国 Boston 的哈佛肯尼迪学院做了博士后研究 (2014-2015)，现任东印度尼西亚 Kupang 的塔鲁玛迦大学 (Nusa Cendana University) 社会与政治系讲师。其研究兴趣是迁徙、人口贩卖、民主参与、乡村社会学。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于德国的法兰克福的歌德大学的人类学获得博士，在德国的帕绍大学 (University of Passau) 取得硕士，主修南亚研究，现在他是印度尼西亚大学社会系的讲师以及社会与政治科学系的讲师。其主要研究是文化研究、社群媒体、社会网络。